

儒藏论坛

(第三辑)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舒大刚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儒藏论坛

(第三辑)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舒大刚 主编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周 颖 朱兰双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藏论坛. 第3辑 / 舒大刚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ISBN 978-7-5614-4238-8

I. 儒… II. 舒… III. 儒学—文集 IV. 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2357 号

书名 儒藏论坛 (第三辑)

主 编	舒大刚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238-8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9.75
字 数	49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百年学府开新运 再向儒林续逸篇

——记四川大学的儒学教育·····	舒大刚(1)
龚编《郑君年谱》校正·····	李冬梅(35)
章太炎学术年谱·····	王小红(78)
龚道耕学术年谱·····	李冬梅(99)
谢无量年谱·····	彭 华(132)
刘师培生平学术年谱简编·····	黄锦君(164)
钱基博学术年谱简编·····	王玉德(188)
金景芳学术年谱·····	彭 丹(193)
李源澄先生年谱·····	王 川(236)
《儒林年谱》小序·····	舒大刚(332)
《儒藏·史部·儒林年谱》提要·····	(335)

百年学府开新运 再向儒林续逸篇

——记四川大学的儒学教育

舒大刚

（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儒藏》主编）

星辉井络，地雄巴蜀；

山川秀毓，西南美焕。

——萧公权《国立四川大学校歌》

四川大学是坐落在祖国大西南的一所高等学府。她植根于古老的巴蜀大地，熔铸儒学精神、巴蜀文化与近代西学于一炉。近代“蜀学”曾被学人视为晚清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①，四川大学又是近代“蜀学”的策源地和学术中心，研究四川大学学术史，对研究“蜀学”消长之迹，特别是探讨近代中国学术重心之形成，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即欲对四川大学的经学教育与研究历史，作一回顾和探讨，以就正于博雅方家。

四川大学作为一所现代新型高校，迄今只有 112 年历史；但是作为具有丰厚文化底蕴、悠久办学历史的巴蜀第一学府，四川大学的文脉和学运，又可以追溯至清康熙年间所建锦江书院（1704—1903）、光绪年间所建尊经书院（1875—1902）和晚清民

^① 李学勤：《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 年第 9 期。

国时期兴办的存古学堂（“国专”，1910—1931）。如果要追述其儒学教育、经学研究的传统，其远源更须从西汉时期文翁石室（约前143）讲起。盖因1902、1903年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与中西学堂合并，组建四川通省学堂（后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四川大学前身；而锦江书院又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文翁石室原址上重建，以传承文翁教泽、振起巴蜀学术为己任的地方学府。因此，锦江书院者，清代之“石室”也；文翁石室者，“川大”之前世也；而“川大”者，则又石室、锦江之现世也。兹欲述“川大”传经、弘儒之历史，自然不能舍文翁石室、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于不顾也！故本文所述四川大学的经学教育与研究，实兼其前世、近世与现世而言。

一、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播德馨： “石室”时期

“文翁石室”为西汉景帝末年（约前143）蜀守文翁所创。历汉、唐、宋、元、明，相沿而不改，一直是蜀郡（或成都府、四川省城）的最高学府，为“蜀学”人才培养摇篮。“石室”历时1800余年从未间断，直到明末战乱，学校才被焚毁。在近两千年办学历程中，“文翁石室”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蜀学人士也为弘扬儒学、研究经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历考其事，盖有四端：

一曰推行“儒化”，移风易俗。文翁为庐江（今属安徽）人，景帝末为蜀郡太守，当时“承秦之后，学校夷陵”，蜀中风俗犹“有蛮夷风”。文翁乃起学校于成都市中，遣张叔等18人诣博士，“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从此巴蜀士人欣欣向学，于是“蜀

之学于京师者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①。《华阳国志·蜀志》甚至称“蜀学比于齐鲁”，“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逐渐形成“蜀学”流派，蜚声于华夏学术之林。杜甫诗：“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苏轼《监试呈诸试官》：“至今天下士，微管几左衽。谓当千载后，石室祠高联。”（《八哀诗》之三《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都对文翁的儒化教育给予高度评价。

二曰肇开庠序，引领全国。文翁兴学，是古代中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创举，开启了中国地方办教育的新篇章。“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汉书·文翁传》）。于是在中央太学外，各地又形成了“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的教育体制，大大促进了儒学在全国各地的传播。

三曰推行《七经》，扩充经典。秦宓述文翁之事：“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②常璩亦谓：“（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隼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③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何为“七经”？全祖望《经史问答》、杭士骏《经解》以“五经”加《论语》、《孝经》。征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知二氏之说可信。“文翁化蜀”用“七经”，于是形成中央用“五经”，蜀郡用“七经”的局面，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兼通五经”（张衡）、“五经无双”（许慎）、“遍习五经”（桓谭），蜀人通群经则称为“精

① 班固：《汉书·地理志》及《文翁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② 陈寿：《三国志·蜀志·秦宓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

通七经”（杨充）、“学孔子七经”（赵典）矣。

四曰刊刻石碑，形成《十三经》。唐代盛行“五经”和“九经”概念，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后又形成《九经正义》（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周礼》、《仪礼》、《谷梁》、《公羊》），“九经”遂成为儒家经典总称，“开成石经”明明十二部（“九经”加《论语》《孝经》《尔雅》），却依然称为“石壁九经”^①。在此背景下，“蜀学”人士又将儒家经典扩大到“十三经”。五代孟蜀毋昭裔、孙逢吉等人组织书刻的“蜀石经”，比“开成石经”多《孟子》，称《石室十三经》^②，此后，《十三经》成为儒家经典的基本模式^③。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在文翁石室所在的地方。明任浚谓：“若夫《石室十三经》，始自孟蜀。”^④清沈廷芳《经解》：“‘五经’始汉武帝，‘七经’始汉文翁，‘九经’始唐郑覃，‘十一经’始唐刘孝孙，‘十三经’始蜀毋昭裔、孙逢吉诸人云云。”^⑤正此之谓也。

文翁创建“石室”，引进“七经”教育，使儒学教育从中央太学下及于郡县庠序，也使儒家经典从“五经”扩大到“七经”。而在文翁石室刻竣并陈列的《石室十三经》，又使儒家经典从“九经”扩大到“十三经”，从而促成了儒家经典范式的最终形成。文翁石室的办学经历和经学的推广，不仅对巴蜀地区有移风易俗的作用，而且对儒家经典体系也具有开风气、成典范的巨大功能，这也许就是“文翁石室”这所千年学府对于儒学的重要贡

① 分别见《旧唐书·柳仲郢传》、《儒学传上》、《儒学传下》、《王友贞传》、《文宗纪》、《郑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曾宏父《石刻铺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舒大刚：《“蜀石经”与〈十三经〉》，载《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

④ 任浚：《十三经注疏序》，雍正《山东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五之六引。

⑤ 沈廷芳《经解》，见《皇清文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二。

献吧。

裴铤《题石室》：“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人心未肯抛毡蚁，弟子依前学聚萤。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文翁开创的地方教育事业，开启了后世蜀人推崇“儒化”、比肩齐鲁的志向，也树立了历代蜀学祖述和继承的典范。

二、石室云霞思古梦，锦江尊经读书声： “书院”时期

“锦江书院”系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奉旨在文翁石室遗址上重建。名称虽易，实质未改，锦江书院仍然是“文翁石室”的延续。锦江书院在清代是四川省城最高学府，“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总督奎俊奉光绪朱批，将四川中西学堂与改制后的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合并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四川大学前身），共存在198年。锦江书院在其上升时期，主张“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成就远大，教绩突出。锦江书院一直居全川书院之首，规制崇宏，名师聚集，人才辈出。乾嘉时期“诗学汉魏，文学《左》《史》，皆极精微”（《清史列传》卷七一）的著名文学家彭端淑，两长书院、二十载教席，“造士尤众”（《丹棱县志》）。“蜀中三才”之一李调元、清末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驥、“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吴虞、近代历史文献学家张森楷等，都出自锦江书院。进入晚清，书院背离“先经义”、“重行谊”办学宗旨，其教学乃以八股为主，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不脱考课与时学之窠臼。阮元、王先谦前后两刻清人经学著作而成《皇清经

解》、《续皇清经解》，收录 390 种、2830 卷，蜀人著述竟无一种入选，历史上曾经引领风骚的“蜀学”，于此疲软已极。

“尊经书院”由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兴办于光绪元年（1875），至二十八年（1902）与中西学堂合并组成四川通省学堂止，共存在 28 年。尊经书院的宗旨，盖欲力矫晚期锦江书院“空谈讲学”、“溺志词章”之陋习，而以“通经学古课蜀士”，欲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化民成俗，振兴蜀学”^①。在教学方面，张之洞初拟设“经学、史学、经济、算学、词章为五门”，带有现代专科学校教育特色，由于师资缺乏、经费紧张而未果，故尊经书院教学主要以经、史、词章为主。张之洞以“两文达之学”相号召，指导书院学生熟读阮文达（元）辑刻之《皇清经解》和纪文达（昀）主撰之《四库全书总目》，注重目录之学和考据之学。张还特地编撰《轺轩语》和《书目答问》，形成了“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自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自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自经学史学入辞章者其词章可观，自经学史学入政事者其经济成就远大”的著名理念。既而湘学大师王闿运两次入蜀执讲，前后七八年，“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操感士子，且以言论议论贬当世”，于是大开风气，蜀士“欣欣向学”，大有文翁教存、石室重光之势！

为扩大图书流通，方便生员购读，尊经书院还设立尊经书局刻印图书，“仅十余年，成书数十种”，如张之洞《轺轩语》、《书目答问》，王闿运手钞《今古文尚书》，手校《南史》、《北史》；廖平《今古学考》、《经学初程》、《群经凡例》，皆书局所刻，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书院出版中心。还创办学术辑刊，汇录和选刊学员论文，提倡学术研究，如《蜀秀集》，《尊经课艺》初、二、三

^① 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拓本，藏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处）。

集，成为当时成都的学术中心。

为“绍先哲，起蜀学”，总结和继承“蜀学”传统，由尊经书院发起，锦江书院继踵，编纂了上起两汉，下迄清人的《蜀学编》，对历史上的蜀学人物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蜀学的优良传统进行了初步总结。这是晚清“蜀学”勃兴以后带来的新气象，也是“蜀学”人士致力于“学统”构建，企图自立宗派的首次尝试。

尊经书院时期，成果丰硕，人才辈出。据研究，“在二十多年里，尊经书院的生员约有2000名以上”，其来源多是全省府县学的高材生。书院以“通经学古”为要，务重实学，不授“八股”，不限年时；教学法也是专经导读，不作填括和死记硬背。学生得以自由探讨，自由讲习，自由思考，自由研究，自出心得，许多人还在学生阶段，即已写出水平较高的专著（如廖平《谷梁春秋古义疏》、《今古学考》），故成就斐然，大家辈出。民国《四川方志简编》说：“自王闿运来蜀，遂以博学穷经为士林倡，于是乾嘉之学大盛于蜀，一时人文蔚起，鸿硕辈出。廖（平）、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尤著令闻焉。”^①胡昭曦也指出：“尊经书院确乎是近代振兴蜀学的基地，是近代四川人才培养的摇篮，也为中国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②尊经书院培养的人才，经、史基础深厚，且具有致用意识，既能“阐述经学微言大义”，又有“崇本达用之方”，如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皆自传统经学而倡言“托古改制”、“复古改制”和“变法维新”；罗纶、蒲殿俊、吴虞、张澜、吴玉章，皆自旧学而高标改良、革命；等等。即以传统国学论，明清蜀人

^① 李肇甫领衔、陶元甘主持、舒君实润饰《四川方志简编》（稿本，藏四川省图书馆）。

^② 胡昭曦：《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见《儒藏论坛》第二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以下引用尊经书院数据，多采自此文。

著作进入《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存目》者殊少，而事隔不到一百年，蜀人著作之进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已猛增至200种左右（据中研院文哲所《晚清四川地区经学家论著目录》），其中大部分属于尊经书院时期王闿运、廖平、吴之英和宋育仁等人著作，“蜀学”不振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

尊经书院时期的学术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长于“三礼”和《春秋》之学。如王闿运承常州学派之绪余，擅长《春秋公羊》学，固无论矣。在他的影响下，廖平亦“长于《春秋》，善说礼制”^①，运用礼制之异区别今文、古文，著《今古学考》，被俞荫甫（樾）推为“不刊之书”；又撰《谷梁古义疏》，名列“清人十三经新疏”之一；还有《公羊解诂三十论》、《左传古经说》等春秋学著作20余种（今存16种）。吴之英也明于《公羊》，“尤邃《三礼》”，著有《寿栎庐丛书》，论者谓其“言《周礼》者最多最精”^②，其《仪礼》三书（《仪礼衷固》、《仪礼器图》、《仪礼事图》），尤称精绝。宋育仁擅长文学，亦善经学，撰《问琴阁丛书》，有《周礼十种》，主张“复古改制”，宣传维新变法，为改革号角。

二是“以复古求解放”，将乾嘉所复东汉古文学，进至西汉今文时代，并进而将经学复至先秦子学和古史之学，最终实现经学向史学的转变^③。自郑玄混合今古，学人不知“今学”“古学”之别，乾嘉之学多停留于名物训诂即“许郑之学”；常州学派讲

① 蒙文通：《议蜀学》，见《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

② 谢兴尧：《周政三图三卷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3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③ 廖平本人即是“以复古求解放”的自觉实践者，其《与康长素书》云：“岁星再周，学途四变。由西汉以返先秦，更由先秦以追邹鲁。”（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稿》，重庆图书馆藏原稿本，收入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舒大刚主编《儒藏》第100册）卷三“民国二年”。

《公羊》三世法，但不知今古文分歧所在，未得要领。廖平《今古学考》成，“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刘师培谓：“贯彻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①章太炎也说：“余见并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②把中国经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其后，廖氏门人蒙文通出，复推寻今古二家致异之源，而得“鲁学”“齐学”（今文经学）与乎“晋学”（古文、史学）之秘，将经学分歧从两汉的礼制之异，上溯为先秦的文化殊方和古史异源，从而实现了对经学家法、师法的彻底解放，真正促成经学向史学过渡。

三是拓展经学内涵，扩大儒学范围。廖平《今古学考》卷下：“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今文：《尚书》、《齐诗》、《鲁诗》、《韩诗》、《戴礼》、《仪礼记》、《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古文：《尚书》、《周官》、《毛诗》、《左传》、《仪礼经》、《孝经》、《论语》、《戴礼》。《易》学不在此数），以成蜀学。见成《谷梁》一种……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③他不仅要严格区分今古文学，还要将儒家经典范式扩大到“十八经”，是对“蜀石经”形成的“十三经”的重大突破。这不仅仅是“以成蜀学”，而且是要重振宗风、再兴孔教，重构儒家经典体系。可惜他后来屡变其说，无暇于此，“十八经注疏”没有完成，留下历史遗憾。

四是开创近代经学史研究新局面。近世以来学人侈谈“今古文学”问题，实则这一话题肇端于晚清“蜀学”中坚廖平。皮锡

① 刘师培：《非古虚下》，《左庵外集》卷五，《刘申叔遗书》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② 章太炎：《程师》，《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③ 廖平：《今古学考》卷下，《廖平选集》上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

瑞《经学历史》：“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论经学于今日，当觉其易，而不患其难矣。”^①使“今人”知今文、古文之别者，能获“讲经学”之“易”者，即廖平其人。^②

五是托古改制，以经学讲革命，讲改制，诱导了思想解放。尊经书院讲经学多主“托古改制”或“复古改制”，廖平、宋育仁、吴之英等人俱是如此；诸人还创办《蜀学报》、《蜀报》，鼓吹改良。是廖平“二变”尊今抑古思想，通过康有为引起了近世思想解放运动，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精神武器。此人所共知者，兹不赘述。

李学勤认为：“晚清以来，有两个地方的学术研究很有影响，即川学和湘学。廖平是川学的代表之一。”又说：“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心有所转移，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③正是针对当时以尊经书院为代表的晚清蜀学而言的。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周予同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有人甚至认为，两汉本不存在今古文对垒，是廖平挑起这场千古公案。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国学今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③ 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学术》总第6期，2001年第2期；李学勤：《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9期。

三、正声微茫骚人怨，废兴万变宪章沦： “学堂”时期

自“两院一堂”合并成立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至国立四川大学成立，其间各时期，儒学教育和经学研究在四川大学节节退缩，逐渐式微。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该学堂系 1902 年由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锦江书院组建而成，是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办学模式合一的高等学府。

高等学堂除保持书院时期的师资力量外，也保持了书院时期的学科优势。学堂分正科和附科两大类，正科即本科，设有一部、二部、三部，分别是文科、理科、医科，其中文科教授经学、政法、文学、商科等知识。三部还有共同公共课，开设人伦道德（讲《宋儒学案》）、经学大义（主讲《五经》）等，其传统气氛十分浓厚。附科设有速成师范科、优级师范科、普通科、体育科、测绘学堂、铁路学堂、半日学堂、附设中学堂等。其“优级师范科”生员要求具有贡生、廪生功名，专门培训中国儒经、诸史、词章之学方面的师资。高等学堂除讲授教育部颁布课程外，还重视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等教学。

在师资方面，高等学堂对教师的水平和资历要求都很高，除聘有数十名留洋人员和外籍教师外，国学教师多具有科举功名（进士、举人），或者本身就是尊经、锦江两书院的“宿儒”，如翰林院编修胡浚（兼学堂总理）、状元骆成骧、进士廖平，以及谢无量、刘豫波、杨沧白、徐炯等著名学人；特别是三任总理（校长）胡浚、周翔、骆成骧，都是社会名流和政府要员。正科生源是省内外中学堂毕业生、各府县有功名的生员。条件优越、

师资雄厚，学生来源层次高，故高等学堂（含附中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朱建德（朱德）、郭沫若（开贞）、张培爵、张颐、温少鹤、王光祈、蒙文通、周太玄、李劫人、魏时珍、张怡荪、曾琦等，后来在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等学堂后来经过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大学等阶段的发展，再融入其他专门学校，成为今天四川大学的主要源头。

辛亥革命后，推行“壬子学制”，改变前清“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不再提倡“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学堂改称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经学科”，大学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而以文、理为主。

1912年四川高等学校（四川高等学堂）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四川高等师范学堂）合并，组成“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高师”）。其课程设置也随新的学制有所调整，设国文部、英语部、博物部、数理部；国文部又分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语言学等。“国文与国文学”课程，有讲读作文、诸子学、群经大意、中国文学史、文字学、韵文等。教员则有曾学传（教授宋明理学）、宋育仁（教授文学史、骈文）、廖平（教授诸子学、群经大意）、骆成驥（教授国文）、龚熙春（教授国文）、龚道耕（教授经学通论），等等。虽然传统经学已经没有专门的学科门类，但仍是“国文部”重要的课程，教员也是该门类中最优秀的一群。

吴玉章长高师时（1922—1924），又改国文科为文史科，专业课程有国文、国史、文学概论、文字学、诸子、文学史、讲经；选修课则有中国伦理学史、古籍校读法、国故概要、诗词赋选讲等，还基本保留了传统经学的科目。国文教员中还有李植、

文龙、谭焯、龚道耕、林思进、赵少咸、祝纪怀等著学宿儒。只是课时大为缩减,《经学通论》已经从原来每周6~11学时,减少为2学时;特别是取消了以宋明理学为内容的伦理课,蜀学宿儒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存古学堂”至“国学专门学校”。历史上四川大学经学研究的另一重镇,是与高等学堂并行发展的四川存古学堂(后改称国学专门学校)。

随着清廷壬寅、癸卯学制的改革,专门教育在四川得到蓬勃发展,形成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和五大专门学堂(四川法政学堂、四川藏文学堂、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四川工业学堂、四川存古学堂)。

四川存古学堂是继张之洞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湖北设立存古学堂之后,于宣统二年(1910)设于成都,校址选在城南黄门街杨遇春宅,谢无量任督监(校长)。辛亥革命后,各省存古学堂皆奉新教育部令停办(有的省先已停办),而四川存古学堂则通过更名方式续办。四川存古学堂1912年2月改称四川国学馆,下设教科部、印刷部、杂志及讲会部。同年6月,四川军政府咨询机构枢密院改为国学院,吴之英任院正(长);11月,国学馆与国学院合并,吴之英任院正,谢无量、刘师培任院副;原国学馆教科部改称国学学校,隶属国学院,刘师培以院副兼校长,其课程则采用存古学堂章程“变通办理”。1914年3月,国学院结束,专办国学学校,廖平任校长。1918年,正式定名“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国专”),先后由宋育仁、廖平、骆成驩、蔡锡保任校长。

1927年,“国专”作为“五专”之一,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国专”改称中国文学院;1931年迁至国立四川大学校本部(皇城)。存古学堂(“国专”)独立运行了21年,“从1910年迄1931年,几经嬗变,六易其名,均以国学一脉相承,校舍依旧。